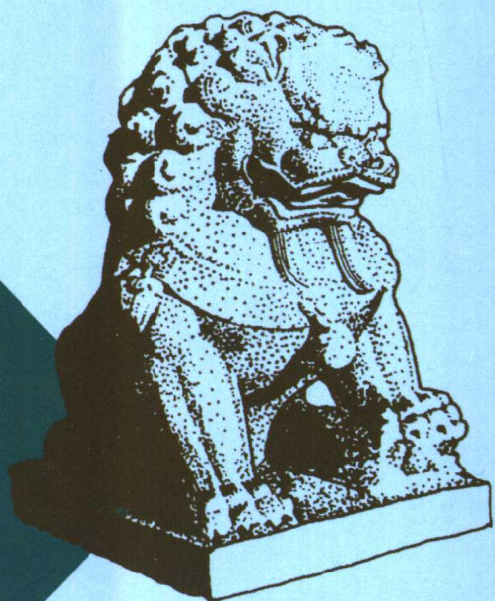




晚清社会思潮研究

郭汉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晚清社会思潮 研究

郭汉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社会思潮研究/郭汉民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 - 5004 - 3956 - 3

I. 晚… II. 郭… III. 社会思潮 - 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7224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3

字 数 244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郭汉民，1945年生。196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80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留校工作。现任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合作主编著作《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六卷、第八卷，《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蔡锷新论》，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以及《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辛亥革命新论》、《郭嵩焘与中国近代开放》、《谭嗣同与戊戌维新》等，合著《中国近代史实正误》、《辛亥革命》、《我们的中国》、《清末社会思潮》、《百年民族精神》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各种社会科学报发表论文 80 余篇。

序

耿云志

汉民同志向以治学勤奋扎实而广为朋辈所赞许。他新近完成《晚清社会思潮研究》，索序于我。近些年来，我替中青年朋友的书写序差不多都是只说我自己的话，对于他们的作品则很少直接评论。这主要是因为难得认真细心地研读作品，故不敢轻下判语。但对于朋友的研究工作，往往抱有相同的兴趣，所以总还是有话可说。这可算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吧。

晚清是中国社会由封建末世艰难迈向近代的转型期，社会诸方面都发生急剧的变动。自然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思想也在急剧改变中。思想反映存在，从总体上说固然落后于存在。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思想能够起到预示和先导的作用。因而研究社会思潮的变迁，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思潮所反映的社会存在，而且往往还可以透过思潮而窥见到社会变迁的大趋势。

从嘉道到光宣百余年间，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逐渐式微，而始知中华之外有世界；传统的重道轻艺的观念受到怀疑、否定，科学技术的地位渐获承认，且由技进而为学；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怀疑、否定，工商富

国、工商立国的观念逐渐由民间的鼓吹变成官方的政策；传统的专制体制受到怀疑、否定，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逐渐成为进步人士追求的目标；传统的宗法观念、纲常名教观念受到怀疑与批判。同时，中国思想也逐步脱去传统的外衣。如果说经世思想还完全是从传统的经典出发进行阐述；洋务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则通过援西入儒，将近代西方学说、思想纳入传统思想学说的范围之内；那么，戊戌维新思想则已经“会通中西”构筑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理论体系；到立宪思想和反满革命思想，则尽管仍有思想家利用传统思想资源来为立宪、革命摇旗呐喊，但主要的理论依据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经典，而是近代的政治法律学说了。

造成晚清思想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诸多原因中，我以为三大因素最为重要，一是紧迫的民族危机，一是社会变迁，一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

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是晚清社会的一大基本特征，也是推动晚清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过，危机的存在并不自动地推动思想的发展，只有当危机被人们真切感受到时，它才成为动力。晚清的民族危机意识是逐步形成、发展的。鸦片战争前，国人还沉醉于天朝尽善尽美的幻觉中，对于西方一日千里的进步毫无察觉，对于即将面对的险恶局势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表现在思想上，埋头考据的汉学家，空谈心性的宋学家自不必言，即便是关注时务的经世思想家们，他们思想主要针对的仍然是社会危机日重而官场腐败、士大夫依然不究实务的风气，主要的议题还是如何改革河、盐、漕诸大政以及西北边疆问题。鸦片战争也并未立即给中国朝野造成太大的震动，战争过后，朝野风气依旧，大有雨过天晴之意，谈不上有民族危机意识。因此，鸦片战争后二十年间，了解西方的渠道较前已大有拓展，而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甚少进展。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直到战

争过后二十年始付诸实施。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只是使部分有识之士感到西人东来为千古未有之变局，觉得要自强必须效法泰西，洋务运动也就由此兴起。洋务运动三十多年间，有民族危机感的，仍只是一些思想家和部分洋务官僚，多数的官僚士大夫依然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①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习格致，倭仁一奏而部曹翰林却步；洋务学堂招生，当局以利诱之，而官绅子弟仍多不屑入；丁日昌以讲求洋务而得“丁鬼奴”之恶名；郭嵩焘《使西纪程》以称羨西洋而犯天下之大不韪等等。此皆足见当时风气之锢蔽。风气所以如是，与士大夫依然自大，没有民族危机感，有直接关系。直到甲午一役，始“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梁启超语），孙中山“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呼声，康有为“保国”、“保种”的号召，震撼了不少人的心，民族危机感迅速在官僚士大夫中蔓延。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严复翻译《天演论》所表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能迅速风行。庚子事变以及《辛丑条约》，使思想界、知识界有了更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大体而言，从嘉道到光绪甲午前，中国朝野对于民族危机的感觉相当迟钝，其心态尚较从容，步伐不免缓慢；而甲午之后尤其是庚子之后，思想界、知识界国亡无日的感觉极为强烈，其心态近乎惊慌，步伐不免凌乱。

晚清思想的演变，与晚清社会的变动紧密相关。几千年来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体系，遇到内外危机，开始破败，已不足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原来掌握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多种优势资源的阶级阶层发生分化，不少人从其原本所属的阶级、阶层、群体中游离出来。新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方式出现了，资产者出现了，同外国资本主义以及同本国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式知识分子、近代传媒与社会团体接踵出现，这为新思想的普及并形成新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群众基础和载体。总之，旧社会中正在产生和制造自己的对立物：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阶层，新的社会群体，新的利益需求，不可遏止地被一再重新制造出来。固有的思想观念无法继续笼罩他们。于是反映他们的利益需求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就必然地逐渐确立起来。新的社会思潮推动社会朝着变革的方向发展，于是，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新政运动、立宪运动、革命运动等等都陆续发生了。而这些活动反过来又推动着新思潮的发展。

西学输入是影响晚清思想发展的另一基本因素。晚清西学输入并非一帆风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国，遂养成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不易承认西学的长处。中国有自成体系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其中不少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等，与西方有重大的区别，这容易造成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冲突。同时，由于晚清西学输入与列强侵略紧密相随，遂使一般国人难以区分西方侵略者与西学，难以处理反抗侵略与学习西方的关系。但现实危机的刺激，还是使国人逐渐认识到西学的长处，逐渐接受、引进西学，“每次战败，外患益烈，而欧化之输入，亦随之而益盛焉”。^① 西学的输入，为晚清思想提供了新的养料，但晚清的西学输入具有明显的功利性，“我们只知道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接近西洋文化”^② 因此这种养料并不充分。尽管如此，西学输入还是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传统，使晚清思想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政策、制度、思想观念、学说等等逐渐

①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5 页。

②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24 页。

受到有识之士的怀疑、批评。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危机，中国传统中的一些思想、主张、学说等，比如传统的重商思想、民本思想、仁政思想、经世思想、大同思想、《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墨子的兼爱学说等等，都被重新发现或给予重新解释，成为接受、理解西学的桥梁。

如汉民同志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说，晚清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缺乏伟大深邃的理论著作，却不乏云涌风起的思潮”。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加剧着中国社会固有的矛盾。为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挽救严重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救时主张。这些主张中之符合时代潮流者，感召一批人，形成思潮。以后，危机不断加剧，既有的救时方案不能解决问题，人们又寻求新的方案，遂形成思潮迭兴的局面。这就使挽救民族危机、谋求国家富强成为晚清思想的核心议题，而思潮则成为晚清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研究晚清思想不能不研究晚清社会思潮。本书从社会思潮去研究晚清思想，可以说找到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一定的思想总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着应对环境的挑战而利用既有的思想资料结构而成的。思想史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罗列若干位思想家的若干思想主张，而必须对于思想家思想的时代及其思想主张针对的现实问题，思想家所利用的思想资源，以及思想家的思想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后来思想家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确切地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的真实内涵，才能对其思想主张的价值和局限作出合乎实际的评判。思潮的研究也一样。汉民同志深明此道，故本书不是从思想论思想，而是紧扣晚清历史来论述晚清思潮，从内忧外患的时局、资本主义的发生与成长、西学的输入与传播、前人的思想遗产等角度来论述晚清思潮的兴起、发展、更迭，从言论、著作、

刊物、组织、运动等角度论述思潮的规模与影响。这样，我们看到的思想史不再纯粹是思想观念的历史，而是在活生生的历史中发生并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思想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思想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但是历史研究往往忽略了这种连续性。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对历史进行分期，而本来相对的分期又由于近代学术的专门化倾向，往往变成固定的区划，遂使历史的连续性在研究中就被割断。一是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习惯于以“进步”、“反动”来划分历史上的人物与思想，本来存在的人物、思想因为戴上了“反动”的帽子就被忽略。本书对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与一般的“近代思想史”始于1840年不同，本书的研究范围始于嘉道而终于光宣，将晚清百余年间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这是很有眼光的。正如作者的研究所表明的，嘉道间经世思潮“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其批判时政、呼唤改革的精神，关注实务的学风，正是晚清各主要思潮一以贯之的精神特征，经世思潮实是晚清思潮的源头，而这一点在阐述和研究“近代思想史”时是决不可以忽视的。第二，本书对于晚清出现的各主要思潮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所用篇幅相当大。通过作者的阐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晚清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趋向。第三，以前的许多近代思想史著作对于戊戌变法以后的改革思想的发展注意不够。这是由于研究者们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已经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必须走革命之路，戊戌之后的改革思潮违背这一方向，所以就是“反动”的。于是在许多研究著作中，戊戌变法到立宪思潮、革命思潮兴起之间的思想史变成了空白。本书用两章的篇幅论述了戊戌后改革思潮的发展，指出改革

思潮在戊戌后不仅存在，而且有了相当的深化和提高，是革命思潮与立宪思潮的兴起的思想条件。这一研究重构了戊戌维新思潮与清末的立宪思潮和革命思潮之间的历史联系。

目 录

序	耿云志 (1)
第一章 引论：晚清社会与晚清社会思潮	(1)
一 晚清社会转型中的近代思想	(1)
二 晚清近代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4)
三 晚清社会思潮演变概览	(9)
第二章 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潮	(15)
一 经世思潮的兴起	(15)
二 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特色	(23)
三 经世思潮的历史地位	(36)
第三章 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	(41)
一 咸同之际变革思潮的兴起	(41)
二 咸同之际变革思潮的基本主张	(48)
三 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53)
第四章 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	(57)

一	洋务思潮的内涵及其兴起的历史条件	(57)
二	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67)
三	中西文化和新旧思想观念的交锋	(83)
第五章 光绪甲午前早期维新思潮		(90)
一	早期维新思潮的兴起过程	(90)
二	早期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95)
三	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之异同	(108)
四	早期变法维新思想的历史地位	(121)
第六章 光绪甲午癸卯间维新思潮的发展(上)		(128)
一	甲午战后变法维新思潮的兴起	(128)
二	变法维新思潮的蓬勃发展	(138)
三	变法维新思潮在斗争中走向高涨	(153)
四	戊戌维新思潮的内容、特点和意义	(160)
第七章 光绪甲午癸卯间维新思潮的发展(下)		(174)
一	戊戌政变后维新思潮的延续	(174)
二	戊戌政变后维新思潮的深入	(180)
三	戊戌政变后维新思潮的特点与历史地位	(195)
第八章 清末君主立宪思潮(上)		(211)
一	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	(211)
二	君主立宪思潮的发展	(232)
三	君主立宪宣传的主要内容	(238)

第九章 清末君主立宪思潮（下）	(254)
一 国会请愿风潮与君主立宪思潮的高涨	(254)
二 君主立宪思潮与辛亥革命	(263)
三 君主立宪思潮的历史地位	(274)
第十章 反清革命思潮	(286)
一 反清革命思潮的兴起	(286)
二 反清革命思潮的特色	(294)
三 反清革命思潮的升华	(298)
后 记	(311)

第一章

引论：晚清社会与晚清 社会思潮

一 晚清社会转型中的近代思想

“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晚清时代，直到宣统退位，历时 110 多年。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无论疆域的辽阔、国家的统一，还是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盛世相比，毫不逊色。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它却已经开始落后于时代潮流。世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往住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还在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尚未出现的时候，在地球的西半部已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随后又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彻底摧毁了传统社会的基础，实现了社会的全面变革。“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

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它将消灭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国家的孤立状态，消灭各民族原先闭关自守状态所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在英国确立起来。

英国资产阶级企图以廉价商品为重炮轰开中国大门，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816年又派阿美士德率团来华要求通商，就反映了这种企图。这时清王朝已从“康乾盛世”的鼎盛状态中跌落下来，进入了危机严重的衰世。中国社会在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时候，仍在旧的体制中缓缓运行。这种体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以血缘关系与地缘组织相结合的宗族制度，儒家思想为这一体制提供意识形态保障，科举取士制度为地方士绅提供了进入官僚体系的途径。这种旧体制经过长期运行已臻于完善，如无来自外力的强大冲击，这种体制很难发生变革。即便改朝换代，整个社会仍然还会在旧的体制下继续运行。

鸦片战争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强大冲击。“中国皇帝为了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鸦片——引者注），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①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马克思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旧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从此，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力；二是打破封闭，学习先进，追赶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富强，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曾坚持不懈地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始则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继则以西方的富强为参照系，比照中国，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

② 同上书，第264页。